

二十年的接力棒——文津讲坛工作琐忆

齐世峰

文津讲坛 2020 年元旦讲座的主讲老师，是从深圳赶来的陈跃红教授。我安排好她下榻的国图宾馆，街边的路灯已然点亮。打开微信，我看到了《光明日报》的讲坛主编史楠老师发过来的文津讲坛千期纪念约稿。匆忙拜读了史老师的文字，就赶紧向组长汇报，看是否来得及排上专辑。从国图宾馆到国图地铁站口，本不远的距离好似被冷风和内心的焦灼拉长了不少，一边跟史老师回复沟通，一边再细读一下稿件。这一读不要紧，瞬间也引发了自己对文津讲坛工作相关或不太相关的点点滴滴回忆……

文津讲坛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岁月，七百余位专家学者，为读者带来了一千场文化飨宴。绝对数字看似不大，但是文津讲坛的开创、对莅临专家学者的斟酌考量、近二十年如一日的坚持，在全国相关单位的相关部门都是掷地有声的。当然，这些也都是我在接手文津讲坛一年多以后才逐渐了解的。尽管我的馆龄马上达到十年，从原部门负责国图讲座、文津图书奖、传统文化培训直至 2018 年 4 月底“临危受命”地接手文津讲坛，几乎一直都在做与讲座相关的工作。相熟的同事也总爱调侃，“你又做回老本行了！”可是每每翻查学习以往的讲座档案材料，与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沟通交流，与老读者、新读者接触了解得越深入，心里越是自豪和忐忑。自豪的是，自己有幸接手从事这么一项深有渊源、享有盛誉的工作；忐忑的是，自己的学科背景、精力能力能否胜任它。前不久，一千期特别活动前夕，我和搭档“美眉姐”轮流焦虑，我还打趣道，“如果做不好，怎么对得起蔡老师、孟老师、易老师、戴老师等历代文津讲坛‘主理人’……”幸而文津讲坛有多年来积累的工作机制、规范流程，有专家学者、读者、媒体的关注和加持，讲座都圆满完成。

文津讲坛的选题，也有自己的原则和规范，基本以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科类选题为主，邀请主讲人则多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，对于主讲人的职称、学术成果、社会影响等也都有考量。每次在工作组上报选题后，在各自领域具有一定建树和有所研究的领导，都会做出相应回复和建议。刚接手文津讲坛时，我对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流程颇有不解，因为之前部门的工作流程貌似简洁爽快得多。可是随着工作的深入，愈发理解这样的工作机制和流程是文津讲坛坚持二十年“阳春白雪”的重要原因。每个人的知识构成和学识背景都是有限的，何况还要面向在北京深厚多元的文化背景中浸淫的北京读者们。谨慎而全面的把握选题，才能保

证文津讲坛的口碑影响。

与莅临开讲的专家学者们沟通更是我难忘的经历。从最开始的邀请接触，到现场接待，自己都是在“强装镇定中”不卑不亢地进行工作。尽管有的选题不是我的专业或兴趣所在，可是他们都是在所在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，是学界敬仰的名家，难免担心自己的不足会贻笑大方。在讲座前后的沟通交流中，他们的学识、研究方法、为人处世方式都令我如沐春风。主讲专家们学识研究无论对于读者或是于我们工作人员都大有裨益，并且在与专家们的沟通交流之中，还能获得学术之外的提点和启发，以及获知曾经的讲座历史。

比如我在邀请北京大学房德邻教授来讲座时，尽管终被婉拒，却在一来一往邮件沟通中得到了佐证国图讲座历史的信息，房教授告诉我，“上世纪六十年代（我在北京郊区小学教书），有人送给我一套当年系列讲座的提纲，都是名家，我还记得有文怀沙讲屈原。那时书少，所以这套提纲我看过多遍。后来借给别人了。”

有些主讲老师则“公私分明”，让人感佩。例如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的王邦维教授在讲座结束后，仍耐心为提问读者答疑解惑、给所要签名的读者签字留念，在读者都离场得差不多得时候，才悄悄告诉我：“讲座开始前几分钟，家人短信告知家里发了大水，现在不知什么情况，只得先告辞啦。”王教授如此敬业，让人不禁想起其师季羨林先生。

再如策划民国文学选题时，我们想邀请社科院文学所的张中良老师，拨电话过去没有接听，然后发短信过去不久，便收到回复：“你在七年前邀请过我，当时讲的是抗战文学。”对张老师的记忆力，我着实吃惊和敬佩。很荣幸张老师答应了来文津讲坛。一个月后，退休返聘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张老师不辞辛苦往返京沪带来一讲。

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考古系的魏坚教授、社科院考古所的郭物研究员、浙江省考古所的刘斌所长等主讲老师，都是在繁忙的教学、考古、科研工作间隙，拨冗莅临为读者带来考古现场的神秘和诠释。近年来文津讲坛每年都有五十场讲座，分享了凝结着五十位专家学者的最新、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。

北京的读者是最有福气的读者，每年都有那么多文化演出、展览、讲座等文化活动。北京的读者也许也是最挑剔的读者，毕竟看过了太多，见过了太多，听过了太多，亲身经历了太多。文津讲坛的读者里最让人先注意到的肯定是那些头发花白的老人，他们来得都很早，坐的位置也很靠前，有的还积极提问，当然有的也很喜欢提意见。随着慢慢接触，或多或少对他们也有了大概了解，他们很多还会组团去各大文博机构参加讲座或看展。从几位健谈老读者的口中，我也逐渐对几位老读者有了印象：有一位毕业于辅仁大学的 90 多岁的读者，家住通州却常来听讲；一位不爱讲话精神矍铄的老人是农科院的专家；有位瘦削蹒跚但却坚

持用颤抖的手记笔记的老人，马上就要 90 岁了；还有坚持十年听讲文津讲坛，每期都要主讲人签名的阿姨，除了参加北师大女附中校庆之类的个别情况，几乎从未缺席；还有那位五十岁左右，措辞稍显随意、坐姿有时过于放松，偶尔找我“借茶”的读者，竟然每次都是从通州宋庄赶过来；还有常来话不多，固定坐在倒数第五排右侧的中新社老记者，如果不是找他约稿真不知他的职业；等等，等等。

讲座的服务人员，除了我们常规工作人员，还有来自同一科组、同一部门辅助文津讲坛工作的十几位同事，平常大家不在一个办公室其实鲜有交流，不过却有着文津讲坛一分子之间的默契。面对一些突发情况，大家总能相视微笑，知悉彼此心意，有条不紊地分工协作处理。遇到难于处理的棘手情况，大家也会眼神、动作彼此暗示，寻求帮助和迅速汇报，及时、妥善处理好现场状况，保障讲座顺利完成。

不长的时间，勾起的回忆却令人鼻酸不知所措。这时手机震动，收到了组长的回复，“这竟是我的同级同学。”这指的是光明日报的史楠老师。身在不同单位的两位旧识，却都又经意或不经意为文津讲坛贡献了不少，应该有种“相逢不相识”的惺惺相惜吧。我的工龄即将达到十年，二〇二〇也将迎来文津讲坛开创二十年纪念，在这么多同事、领导、专家学者、媒体、热心读者的共同努力下，我想，这个接力棒在我们手中一定会传递地更加有力。